

## 書 評

湯 志 波\*

**嚴志雄**

### 《秋柳的世界——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》

香港：香港大學出版社，2013 年，232 頁，ISBN978-988-8139-13-2

王士禛（1634-1711），字子真，一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又號漁洋山人，新城（今山東桓台縣）人，公認為康熙詩壇盟主，所提倡的「神韻說」風靡清初詩壇。王士禛研究亦是清代文學研究熱點，筆者目力所及，本世紀出版專著就有：蔣寅《王漁洋與康熙詩壇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1）、裴世俊《王士禛傳論》（中國戲劇出版社，2001）、黃河《王士禛與清初詩歌思想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2）、王利民《王士禛詩歌研究》（中華書局，2007）、孫紀文《王士禛詩學研究》（寧夏人民出版社，2009）等，可謂成果頗豐。與上述專著重點考察王士禛文學成就、詩學思想不同，嚴志雄新著《秋柳的世界——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》另闢蹊徑，以王士禛早年成名作〈秋柳詩四首〉及當時名家之和詩為中心，對這個清詩創作、詮釋中的「小傳統」展開探討，通過詩歌文本細讀，將〈秋柳詩〉背後隱藏的作者心理活動、易代之

---

2015 年 8 月 22 日收稿，2015 年 12 月 17 日修訂完成，2015 年 12 月 17 日通過刊登。

\* 作者係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。

Tang Zhibo i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, Shanghai.

際不同身分文人對〈秋柳〉之回應作了精彩分析，是近年來清代文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。

本書除導論、結語外，共分為四章。首章〈秋柳、科舉、變調——王士禛〈秋柳詩四首〉新探〉，借助皮埃爾·布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「實踐」理論之「行動者」、「習性」等概念，指出〈秋柳〉詩背後隱含的心理及精神因素，對〈秋柳〉之藝術、思想特徵作了重新詮釋。第二章〈明遺民對〈秋柳詩〉之回應——顧炎武、徐夜〈秋柳〉之賦詠〉，以顧炎武、徐夜為代表，考察遺民群體對〈秋柳〉詩之回應。王士禛〈秋柳〉四章迅速傳播，多是由遺民和詩所推動，所謂〈秋柳〉詩中「故國之思」，亦是受遺民群體箋注、唱和之影響。第三章〈糾結複雜的心事——曹溶與朱彝尊之遙和〈秋柳〉〉，朱彝尊亦為遺民詩人，但作者卻將其與「貳臣」曹溶一起論述，不僅是因兩人同時唱和〈秋柳〉，更與其詩歌內涵有關。第四章〈「秋柳」的回歸——冒襄、陳維崧〈秋柳〉詩中江南「朱門」的創傷〉，主要考察江南文人冒襄、陳維崧和作。王士禛在大明湖畔賦詠，首先想到的是「殘照西風白下門」——江南的秋柳，而見證了明清易幟的江南文人冒襄和陳維崧，和〈秋柳〉之作將讀者引入真正的「江南」，賦詠中的語言、情感、經驗終於「回歸一體」。四章雖各成系統，又環環相扣，引領讀者進入清初詩壇中「秋柳的世界」。

本書在詮釋、考證、理論方面均有突破。詮釋方面本文僅以第一章中「科舉與賦詩的實踐」為例，文獻考證僅舉《柳洲詩話》圖卷之例，而作者對清代和〈秋柳〉詩之研究，無論結論還是方法，對明清詩歌研究均有啟發意義。以下分而論之。

### 1. 「實踐」理論下的科舉與〈秋柳〉

順治十四年（1657）秋八月，年僅 24 歲的王士禛與諸名士集於大明湖畔，首唱〈秋柳〉四章。一時唱和者數十人，並很快流傳大江南北，和者益眾。〈秋柳〉詩用典甚多，典故又晦澀而多歧，故產生後箋注不斷，如屈復《王漁洋秋柳詩四首解》、王祖源《漁洋山人秋柳詩箋》、徐壽基《秋柳詩詮》、高丙謀《漁洋秋柳詩釋》、李兆元《漁洋山人秋柳詩舊箋》、鄭鴻《漁洋山人秋柳詩箋注析解》等，多是對其典故加以附會增飾，從而形成種種「政治託寓式的詮釋」——「本事說」，如懷思故國說，為「明藩故伎」所作說，弔南明福王舊事說，詠明濟南王故宮說，「南雁」指南都遺老說，「西烏」指顧炎

武說，「枚叔」指錢謙益說，「福藩故伎」指鄭妥娘說等等，其釋義之爭構成近三百年來文學批評史上的一樁公案。種種「本事說」之非雖已為學界所共識，但對〈秋柳〉四章主旨之深入研究，卻甚少有新的進展。

作者對〈秋柳〉四章的詮釋，從詩歌產生的時間、地點、緣由等因素考察王士禛明湖賦〈秋柳〉詩背後所可能隱含之心理、精神因素，在種種「本事說」之外，開拓了新的詮釋空間。〈秋柳〉四首詞意之隱晦、情調之哀傷，確實會讓讀者產生一種歷史滄桑感。且王士禛幼年經歷了明朝的覆亡，崇禎十五年（1642）清軍破新城，王士禛叔父王與敕、王與朋兩家死難十餘人；其後「甲申之變」中伯父王與胤一家又有多人殉難自殺。流賊的屠殺與異族的蹂躪，給王士禛留下了慘痛的印象，故〈秋柳〉詩中的哀傷被解釋成「故國之思」，亦非空穴來風。作者不蹈襲前人舊說，運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·布迪厄「實踐」理論，重新審視王士禛在清初科舉「場域」中的實踐，認為詩中的滄桑感很可能與王士禛、王士祿兄弟在舉業過程中形成的深沉記憶有更直接關係。作者據文震孟《藥園文集》、鈕琇《觚賸》、王士禛《池北偶談》等材料，例舉新城王氏在明代科舉傳家之盛，而至王士禛祖父輩，王氏子弟科舉便開始走下坡路，故王士禛在成長過程中，面對科舉承受著特殊的精神壓力。而順治十四年八月大明湖畔秋集，正是王士禛之兄與諸名士為鄉試而來。王士禛此前舉業頗不順利，加之其兄王士祿科舉不順，亦對王士禛產生了一定影響。因此作者推測，詩中的「滄桑之感」或與王士禛舉業過程中形成的深沉記憶有關，早年的考試不愉快經驗、以及對殿試的焦慮而發生，並從王士禛數年後所作〈丁酉詩〉、晚年所作《古夫于亭雜錄》中找到了旁證。此說發前人所未發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學界對於〈秋柳詩〉之研究，亦曾關注王士禛之心態，如黃河提到王士禛對前明王朝的眷戀與渴望入仕清廷的矛盾心理，<sup>1</sup>但這也是明清之際士人分裂與扭曲的普遍心態，並非王氏所獨有，未能進一步具體考察其科舉壓力下的焦慮心態。無獨有偶，《秋柳的世界》出版後，周興陸同樣重新考察王士禛作〈秋柳〉詩時之當下情景，指出「把〈秋柳〉詩解釋為諷刺南明小朝廷，只能說是屈復自己心理意識的主觀投射。進入新朝之後的年輕的王士禛思考

1 黃河，《王士禛與清初詩歌思想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91。

更多的是如何憑仗科舉重振門楣，「獵取功名，晉身仕途，以期重新振興新城王氏家族，才是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。」<sup>2</sup>亦已注意〈秋柳〉詩與科舉之關係，並指出其作〈秋柳〉詩時真正的意圖是「獵取功名」，佐證了作者之觀點，與其結論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兩說可以相互參照。

## 2. 《柳洲詩話》圖卷與「手抄本文化」

作者熟稔西方文論，使得全書理論色彩較強，但在傳統文獻考證上，同樣毫不遜色。如通過對比王士禛批點《徐詩》與徐夜後人所編《徐隱君詩》，指出王士禛編刻徐夜詩集時對其和〈秋柳〉詩進行了較多的改動（頁 202），這與王士禛「神韻說」的詩學主張有關，對瞭解王士禛文學思想亦有一定幫助。再如對比多種〈秋柳〉文本，指出《漁洋精華錄》中〈秋柳〉四章刪除了小序，是「王士禛（通過門人）去歷史化的一個舉措」（頁 201）。但更爲出彩的還在於以《柳洲詩話》圖卷爲參照，結合中國傳統詩學、書畫藝術與「手抄本文化」研究之相關理論，對〈秋柳〉詩之精彩論述。

1926 年，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福建泉州購得一幅作於順治十四年（1657）的《柳洲詩話》圖卷，畫面中心爲王士禛與三位友人圍坐於大明湖秋柳下論詩，圖後另紙有王士禛書〈秋柳詩〉四首並序，曹溶、朱彝尊和詩及嚴沆、陳伯璣評語。王士禛序云：「……未幾携李曹子溶、秀水朱子錫鬯先後寄遙和之作，□□陳伯璣歎賞不置，好事者遂屬灤水宗老繪成《柳洲詩話圖》見示，並欲予書詩其上。會予奉揚州司李之命，急束裝赴程，又性不耐小楷，強應以答二三君子意，然□□予行半日矣。」可知〈秋柳〉詩多次唱和後已爲文壇雅事，由「灤水宗老」繪成圖卷，「好事者」再請王士禛將〈秋柳詩〉書於圖卷。作者目驗圖卷實物，並對圖卷中的文字重新做了詳細校正。圖卷中〈秋柳〉序前半段與〈菜根堂詩集序〉、《漁洋詩集》中之小序大致相同，但所引部分並不見於袁世碩主編《王士禛全集》，不僅作爲佚文對全集可作增補，更有意義的是，《柳洲詩話》圖卷之文字與通行本對比有多處異文，如圖卷中題記云「僕本恨人，性多慷慨」，而通行本中作「僕本恨人，性多感慨」，結合王士禛時赴揚州推官之境遇，作者對「感慨」與「慷慨」之區別作了細緻分析，進而考察王士禛題圖之際的心理狀況，並結合圖卷中王士禛所

2 周興陸，〈少年記憶與〈秋柳〉詩之微旨〉，《山東社會科學》2014.9: 117。

鈐「余亦澹蕩人」閒章，指出該異文「是自我形象經營的舉措、行動者製造意義與價值的刻意策略」（頁 8-9），亦有一定道理。

學界對王士禛〈秋柳〉詩之研究甚多，但運用手抄本文化理念並結合《柳洲詩話》圖卷作深入闡釋尚屬首次。正如作者所云：「以民國年間重新發現的一幅圖卷、一首詩為研究素材，比勘相關異文，思考相關問題，一步一步走進文詞背後那紊亂而又豐腴的文化、歷史世界中，對『傳世本』背後的那些作者，加深了瞭解以及不瞭解。」<sup>3</sup>「手抄本文化」理論近年來逐漸為學界所重視，過去我們更多關注稿本、抄本，用書畫作品校勘者尚是少數，遑論對書畫進行「手抄本文化」研究。其實明清以來文人與書畫家交流頻繁，很多文人本身就是著名書畫家，書畫傳世作品甚多，其中不乏重要詩文可資參校者，因此在確認其真跡基礎上，<sup>4</sup>辨別書畫作品之異文，是考察詩人當時創作（或書寫）心態、詩歌創作過程的重要依據。手抄本文化理論在文學研究尤其是明清文學中有更廣泛的應用前景，作者以《柳洲詩話》圖卷探討〈秋柳〉詩之成功範例，值得學習借鑑。

此外，作者通過《柳洲詩話》圖卷指出王士禛在大明湖畔賦詩至《柳洲詩話》圖卷製成，再至和作題於圖卷，可以看作是「一樁不斷衍生的書寫事件」，「秋柳詩社」可以說是王士禛啟動、策劃又全程參與的一次唱和活動（頁 3）；〈秋柳詩〉這樁書寫、傳播、詮釋事件中，王士禛除了是原詩作者外，還須以一「行動者」視之，均是將文獻考證與理論完美結合，限於篇幅，不再展開。

### 3. 從回應到回歸：清初詩人和〈秋柳〉

〈秋柳〉一出，和者甚眾，王士禛曾不無得意地回憶說：「順治丁酉秋，予客濟南。時正秋賦，諸名士雲集明湖。……予悵然有感，賦詩四章，一時和者數十人。又三年，予至廣陵，則大江南北和者益眾。」<sup>5</sup>唱和〈秋柳〉之

3 嚴志雄，〈魔鬼在細節中——王漁洋研究與「手抄本文化」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19(2013.9): 262。

4 結合書畫作品考察「手抄本文化」，亦存在著一定風險，比如書畫作品的真偽鑒定問題，《柳洲詩話》圖卷中的文字是否為王士禛手跡？有無作偽之可能？有些書畫作品在書法、美術學界亦存在爭議，使用時尚需慎重。

5 清·王士禛，〈菜根堂詩集序〉，袁世碩主編，《王士禛全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7），頁 2004-2005。

傳統在清代一直延續，但對於如此眾多的和詩，學界卻少有研究。目前僅見張宇生〈顧炎武〈賦得秋柳〉詩新解〉及拙作〈清代和王士禛〈秋柳〉詩初探〉兩篇論文。前者主要考察顧炎武〈賦得秋柳〉一詩與王士禛、徐夜詩之微妙關係，認為其主旨是悼念魯王，<sup>6</sup>然對和詩分析較為簡略。後者選取清代十餘人所作〈秋柳〉和詩，分為遺民詩人、閨秀詩人、科舉得意與失意之人四組略作探討，主要考察王士禛原詩並無「故明之思」，<sup>7</sup>對和詩本身亦未深入展開論述。《秋柳的世界》選取顧炎武、徐夜、曹溶、朱彝尊、冒襄、陳維崧六人和詩，作為三組分章闡釋，首次對和〈秋柳〉詩進行了系統研究。

較早唱和〈秋柳〉者為王士禛從兄徐夜，同年顧炎武作〈賦得秋柳〉，對〈秋柳〉唱和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顧炎武之詩曾引起學界爭論，上世紀三十年代黃節指出，顧炎武此時與王士禛並未相識，其〈賦得秋柳〉並非為和〈秋柳〉所作。此說一出，爭議遂起，王蘧常、王冀民在箋注顧炎武詩時均加以反駁，對黃節之說多有商榷，〈賦得秋柳〉為〈秋柳〉之和詩，幾為學界定論。但作者經過仔細考辨，指出徐夜和詩作於順治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以後至九月間，九月顧炎武與徐夜相會於濟南，得見徐夜之和詩，〈賦得秋柳〉亦作於此時。顧炎武〈賦得秋柳〉其實更多是唱和徐夜之詩，「涉及士禛處則偏取一端而發揮其故國舊君之思，言下且不無調謔原作之意」（頁 105），「賦得」二字已是暗示非和，而是就原唱、和作而賡作。論據充分，言之有理，不僅解決了一樁學術公案，且對顧炎武〈賦得秋柳〉中「故國之思」，對王士禛原作「調謔」之意以及徐夜、王士禛、顧炎武〈秋柳〉詩之「三角關係」作了深入探討。

順治十六年（1659）秋曹溶和〈秋柳〉詩，然與王士禛原詩相比，在用典、辭氣、風調、用韻上差別甚大，且內容晦澀難解，作者自言「曹溶的〈秋柳〉詩寫得甚好，也卻是我處理諸家〈秋柳〉詩最困難的一首」（頁 200）。通過考察曹溶在明末清初的仕宦經歷，「循著習性、性情與詩歌創作實踐的緊密關係」這一線索，探討此間曹溶行事之大概、情感、思想狀態。學界多強調曹溶與明遺民之交往及詩中故明之思，實際曹溶在順治元年（1644）即以

6 張宇聲，〈顧炎武〈賦得秋柳〉詩新解〉，《魯東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4.1(2007.3): 68-71。

7 湯志波，〈清代和王士禛〈秋柳〉詩初探〉，《楚雄師範學院學報》25.5(2010.5): 15-21。

御史身分降清，且連升三級，官至戶部侍郎，因清廷內部黨爭而被貶黜。故作者提醒我們，曹溶詩中雖或有故明之思，但並不妨礙其對清政府的效忠，對於曹溶詩歌的解析，不能陷入二元對立（明清對立）的思維邏輯、話語結構中，以免有所遮蔽。這不僅有助於解析曹溶詩歌，對研究易代之際詩人心態、詩文分析，均有啟發意義。與曹溶同時，朱彝尊亦有和作，結合此時鄭成功金陵之役敗北的政治背景，作者認為身為遺民的朱彝尊與貳臣的曹溶之和詩存在互文性、對話關係，「朱彝尊〈秋柳〉之詩微妙地道出了曹溶的心事」，同樣為我們研究清初貳臣與遺民在「情誼與文字上的交集互動」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。

順治十六年，王士禛出任揚州推官，與江南諸名士遊燕，建立了龐大的交遊網絡，為其成為康熙詩壇盟主奠定了基礎。學界多以王士禛文學創作為關注重點，對江南文人與王士禛之間的互動研究較少，以此探討江南文人之特有心態者更是鳳毛麟角。作者認為江南文人冒襄、陳維崧所作和〈秋柳〉詩在辭語典故、結構章法方面最接近原作，但在寄託、情韻上卻貌合神離，這也正是冒、陳二人和詩之高妙所在。並敏銳察識到，冒襄和詩使用詠柳詩中較為罕見的「朱門」一詞，陳維崧和詩中突兀出現「江南子弟」一語，「隱隱然就是江南『朱門』、『江南弟子』向王士禛此一山東世家子弟幽幽訴說的『江南——朱門——秋柳』的哀怨故事」（頁 13）。作者認為「『秋柳』，是明清之交一個豐腴、有效、有力的隱喻」，是通往詩人生命經驗、情感、思想的重要通道。

詩歌細讀是作者當行本色，如在此之前出版的 *The Poet-Historian Qian Qianyi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9)、《錢謙益〈病榻消寒雜詠〉論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2）等著作，堪稱這方面的代表。本書對〈秋柳〉及和詩之細讀，除了傳統意義上考證本事外，詩歌之間「互文性」關係，原唱與和作、和作與和作之間的對話，均分析細緻入微，更為今後明清詩歌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。

作者對詩歌抽絲剝繭式的文本細讀，亦未僅局限於原詩本身，對相關材料之佔有也是「竭澤而漁」式的，如論王士禛之〈秋柳〉四章，作者對其之前詠及柳之詩句、專門詠柳之詩全部摘錄排比，從而指出〈秋柳〉四章並非其早年詠柳「習性」的延續，其「秋柳」相對此前的「春柳」，是一個斷裂

(rupture)，「秋柳」之「柳」為王士禛處理此一物象的新發展，而「秋柳」之「秋」，則是王氏詩藝「習性」之延續（頁 47-53）。再如學界對顧炎武〈賦得秋柳〉中「賦得」二字之論爭，作者對顧炎武現存詩歌中所有「賦得」體一一考察，再結合〈賦得秋柳〉創作時間、背景，指出「賦得」真實含義（頁 76-83）等，均以資料翔實、考證細密取勝，亦可見作者用力之勤。

清代和王士禛〈秋柳〉詩甚多，但本書限於體例僅選取六人之作，未免有意猶未盡之憾。如閨秀和〈秋柳〉，王士禛自稱：「順治丁酉，余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，南北和者至數百人。廣陵閨秀李季嫻、王潞卿亦有和作。後二年，余至淮南始見之，蓋其流傳之速如此。」<sup>8</sup>清嘉、道間梁章鉅云：「王漁洋〈秋柳〉詩，當時閨秀和者至數百家。」<sup>9</sup>若能將現存閨秀和詩蒐集作為一組加以論述，相信會別有新意。作者指出王士禛原唱〈秋柳〉背後所存在的科舉壓力殊有新意，其實和〈秋柳〉之詩人中不乏進士乃至狀元等科舉得意之人，如雍正五年（1727）狀元彭啟豐有〈秋柳四首追和王阮亭先生原韻〉、<sup>10</sup>乾隆十年（1745）狀元錢維城有〈秋柳四首追和漁洋山人〉，<sup>11</sup>與王士禛殿試前壓抑、焦灼心情不同，他們科舉前的和詩更喜用「柳汁染衣」、「李固袍新」之典故，以預兆自己高中，心態積極向上。將進士群體和〈秋柳〉之作蒐集對比，亦頗有意義。且〈秋柳〉詩之影響絕不僅局限於中國，若將視野放大至域外漢籍，考察東亞詩人之和作，定會有新的收穫。期待作者能將〈秋柳〉和詩蒐羅完備，假以時日，相信會有更加精彩的著作問世。

8 清·王士禛，〈菜根堂詩集序〉，袁世碩主編，《王士禛全集》，頁 2004-2005。

9 清·梁章鉅，《閩川閨秀詩話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705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635。

10 清·彭啟豐，《芝庭詩稿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第 9 輯 23 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587。

11 清·錢維城，《錢文敏公全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442 冊），頁 522。